

上海文化节赛展评总结交流会昨召开,各活动负责人交流运营经验

# 打造一系列顶尖节赛展评活动 提升上海文化品牌标识度

本报讯(记者黄启哲)覆盖全年的文化节、赛事、展览和评奖活动,一直是上海吸引海内外文化资源和优质人才作品,提升全民文化艺术素养,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平台。昨天在市委宣传部举行的上海文化节赛展评总结交流会上,上海书展、上海国际数字互动娱乐展览会(ChinaJoy)、上海国际电影节、斯特恩国际小提琴比赛等二十多家上海文化活动的负责人参会。与会者认为,经过多年打造,围绕出版、游戏、音乐、演出所展开的上海文化节赛展评,已成为影响力的知名品牌。眼下,如何提升上海这些文化节赛展评活动的标识度成为未来发展的关键。与会人士认为,需要结合各个活动自身的定位特色,对标同类国际顶尖文化品牌,增强中国文化和上海文化的辐射力和集聚力。

注重全民参与,深耕普通市民文化素养的提升是上海各大文化节赛展评活动主办方孜孜以求的。走过十五年,

今年的上海书展汇聚近千位中外作家、学者和各界名人,在覆盖全程各区的主会场和百家分会场,共举办1150余场阅读文化活动。在业界看来,上海书展十多年前还仅仅只是读者的购书嘉年华,如今阅读推广活动已成为书展的“第二主角”,上海书展渐成推动“全民阅读”的金字招牌。相较往年书展组委会策划组织阅读活动,推送至分会场,如今作为分会场的实体店也积极主动策划优质活动,将好书名家反哺给主会场,主会场、分会场形成良性循环。这给予主办方启示,书展或可引入更多读书会、阅读平台共同组织优质活动,让书展从“全民阅读”理念的引领者,转而实实在在地为“全民阅读”蔚然成风搭建平台。与上海书展相对应的,是市民文化节通过完善的配送平台与配套服务,将文化渗透至城市肌理,力图最大限度地提升市民的文化艺术素养。而步入第20个年头的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每年开票伊始,海内外大师名团场次的

票都被一抢而空。上海的市民爱书懂书,爱戏懂戏,是这座城市历史文脉所决定,同样也离不开如今高质量的文化活动的培育和引领。

立足本土、服务本土的同时,上海的文化节赛展评活动同样有着对标国际一流的眼界。上海市新闻出版局科技与数字出版处处长丁晓玲介绍:“中国国际数字互动娱乐展览会的第一个目标是日本东京电玩展、韩国GSTAR游戏展,四年前已完成了这个目标。第二个目标是全球最大的德国科隆游戏展和全球最专业的美国E3游戏展,眼下第一步‘赶’的任务已完成,我们有些指标已超越对方。”所以,中国国际数字互动娱乐展在近几年重点围绕专业性和国际影响力的相关要素做出进一步拓展,比如自2014年开始增加了“BT0B展区”,供中外展商在其中洽谈业务、交易,到了今年,BT0B展商总数达到600余家,来自全球3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占比约四成。

这给予不少主办方启示,要对标国际一流寻找差距,就要综合考量各项要素,有针对性提升平台能级。比如,上海国际电影节已跻身全球15个国际A类电影节。组委会正思考在今年成立“一带一路”电影节联盟、深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电影合作的基础上,如何将覆盖面拓展至五大洲。

公开公正透明的比赛流程机制,是斯特恩国际小提琴比赛、上海国际芭蕾舞比赛、上海白玉兰戏剧奖等上海举行的赛事奖项的立命之本。虽然才举办至第二届,斯特恩国际小提琴比赛已在今年被国际古典音乐权威杂志《Musical America Worldwide》列入“2018全球顶尖音乐赛事指南”。指南中,还有伊丽莎白女王国际声乐比赛、古斯塔夫·马勒指挥比赛、BBC卡迪夫声乐大赛等国际顶尖大赛,可见斯特恩国际小提琴比赛的国际关注度。在上海交响乐团团长、比赛组委会执行主席周平看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赛制的公开透明。



第二十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闭幕作品为古巴国家芭蕾舞团的芭蕾舞剧《堂·吉珂德》,该剧人物特色鲜明,西班牙民俗风格浓郁。(组委会供图)



■本报记者 姜方

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迎来第十二届,将于10月19日至11月22日举行。本届艺术节参演节(剧)目共45台,其中境外演出项目25台,境内演出项目20台。参演剧目中原创首演达到23台,超过总数的一半。

名家名团精彩纷呈

艺术节开幕作品为《神话交响音乐会》(暂名),由作曲家叶小纲创作,余隆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石倚洁、廖昌永、沈洋等担任独唱。作品叙述“开天辟地”“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大禹治水”等创世神话。闭幕作品为古巴国家芭蕾舞团的芭蕾舞剧《堂·吉珂德》,该剧人物特色鲜明,舞蹈语汇丰富。

里卡尔多·夏伊指挥琉森音乐节管弦乐团、小提琴家安妮-索菲·穆特携手潘德列茨基执棒的华沙交响乐团,将为艺术节观众推出别开生面的音乐会。首次来到中国的美国纽约城市芭蕾舞团《巴兰钦之夜》、澳大利亚国家芭蕾舞团《睡美人》、挪威国家芭蕾舞团《群鬼》则将带来舞蹈盛宴。罗伯特·威尔逊与杜塞尔多夫戏剧院的音乐戏剧《睡魔》、罗马尼亚锡比乌国家剧院的《俄狄浦斯》、格鲁吉亚科捷·马加尼什维里国立戏剧院的《皆大欢喜》与巴黎北方剧院的音乐戏剧《茶花女》,将展现欧洲经典戏剧的魅力。

部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现新时代风采的节(剧)目也颇引人注目。上海歌剧院歌剧《晨钟》歌颂中国共产党创立的不朽伟业,《源远流长 寻根之旅——雷佳个人音乐会》、上海民族乐团音乐现场《共同家园》将展现民歌和民乐的魅力。上海芭蕾舞团《闪闪的红星》、中央芭蕾舞团《敦煌》和中央歌剧院与宁波演艺集团《花木兰》等,各具特色。在戏剧戏曲领域,则有四川人艺方言版话剧《茶馆》、绍兴小百花越剧团越剧《王阳明》等。

集结上海现实主义题材新创作

今年艺术节舞台上集结了一批上海现实主义题材新创作,全景式展现改革开放40年来的历史画卷。话剧《许村故事》《生命行歌》和《星期日工程师》,将直面旧区改造与养老等社会题材;沪剧《小巷总理》将真实反映居委会干部工作的日常;音乐剧《爱在星光里》则以青年视角观察城市变迁与发展成就。此外,本届艺术节还策划了“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展演”活动,如组委会联合中华艺术宫举办“风生水起逐浪高”美术作品展,将通过长三角地区具有影响力的艺术家的笔触,生动展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的面貌。

今年艺术节委约了一批新作,其中上海原创作品有九台。除《神话交响音乐会》外,由郝维亚作曲、王爱飞编剧、易立明导演的歌剧《画皮》兼具中国文化“诗性”特征、舞台张力和戏剧冲突。杨丽萍编导的第二部现代舞作品《春之祭》,融合其标志性的孔雀舞元素和民族元素,展现她对中国传统文化中自然与生命理念的领悟。而编舞大师阿库·汉姆封箱之作《陌生人》、上海木偶剧团舞台剧《最后一头战象》等将凸显创新与传承的魅力。

艺术节“扶持青年艺术家计划”继续孵化青年人才,孕育未来之星。今年“扶青计划”委约征集共收到中、德、英、美、韩五国近100份作品申报,最终六部原创作品入选。

京剧《贞娥刺虎》将于9月18日在上海大剧院恢复上演

## 史依弘恢复“失落”一甲子梅派经典

本报讯(记者吴旻)上海京剧院青衣史依弘将在京昆传奇《铁冠图》中主演最后一出“大轴”《贞娥刺虎》。这出梅派经典消失于上海舞台一个多甲子后,将于9月18日在上海大剧院首次恢复上演。

《贞娥刺虎》亦称《刺虎》,讲述宫妃贞娥假冒公主,与李自成结义兄弟“一只虎”李过成婚,花烛之夜将其手刃的故事。作为昆剧刺杀旦当重要代表折子戏“三刺三杀”之一,《刺虎》在各大昆剧团演出不断,但在如今的京剧演出中已经近乎绝迹。史依弘不满足于照搬昆剧演出,《刺虎》是梅兰芳“珍爱的戏”,作为梅派青衣,她多年来一直有恢复《刺虎》的心愿。“立足点就是要以梅派的方式,感觉来传承。”梅派人物塑造与如今昆剧团所演的费贞娥不尽相同。曾亲历梅兰芳演出《刺虎》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吴吟秋表示:梅派精华在于演费贞娥的两个层次:“梅兰芳‘珍爱的戏’的杀机以及千娇百媚、假装殷勤,‘面虎则悦、背虎则怒’的分寸拿捏不好就成为‘两面人’了。史依弘也感到,难点在于‘梅兰芳被定义为美的化身,别人演来狰狞,在他身上狰狞也应该是美的。’”为此,她着意刻画了费贞娥作为普通宫女的不少细节,如假扮公主整冠后不自觉带出的托腮情态,面对“一只虎”李过的慌乱腿软等。“好看的戏都是小细节堆出的,”史依弘认为,费贞娥没有脸谱化地被塑造成莫衷一是的职业女刺客,正是梅派艺术的精妙之处。

此次恢复梅派“冷门剧目”,史依弘也是为了“争取在上海保留一些梅派的京剧传统。”《刺虎》启发了梅兰芳在京剧代表作《宇宙锋》中的精彩演出,而自1945年梅兰芳在上海兰心大戏院演出《刺虎》轰动一时后,梅派《刺虎》已几近湮灭。史依弘坦言,“京剧中没人愿意唱昆曲,昆昆越来越少。”但在梅派艺术的传承中,昆剧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 “景在平生命然象书画——超时空水墨展”明举行

本报讯 “景在平生命然象书画——超时空水墨展”明天起在朵云轩艺术馆举行。景在平是著名血管外科专家、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景在平自幼喜爱诗书画,笔下的水墨山水景在平以书法作品风格独树一帜,颇具新意。他先后在上海和匈牙利布达佩斯等地举办书画展,出版了《景在平水墨写意山水书画集》《景在平清逸笔写意山水书画集》《景在平爱心水墨写意山水书画集》和《景在平爱心书画精粹》等作品集。

近几年来,景在平一边创新微创手术技术,一边义卖自己的书画作品,募集爱心善款,免费救治了许多心脏病瓣膜狭窄患者。他的书画创作践行着“医学与人文相结合,技术与艺术相结合,科学与文化相结合”的文化理念,也诠释了“刀笔相通”的人生追求。本次展览展出了他近年创作的新作。(庄文)

上海图书馆新发现的李霁野致茅盾信及茅盾未刊译稿,牵出一段鲜为人知的译坛往事——

# 茅盾一生中曾两次翻译《简·爱》

■本报记者 李婷

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以其优美的文字和深刻的思想内涵在世界文学中占据独特的位置。在中国,这部传世名作也被翻译成众多版本风靡至今。记者从昨天在沪举行的中国作家手稿与文本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获悉,我国现代著名作家茅盾一生中曾两次翻译过《简·爱》,但基于各种原因都在中途停止。第二次的未完成手稿新近在上海图书馆中国文化名人手稿馆被发现。同时被发掘出的还有一封《简·爱》最早中文全译者李霁野写给茅盾的信。这封信是两位文化老人的最后一次往来通信,此前从未公开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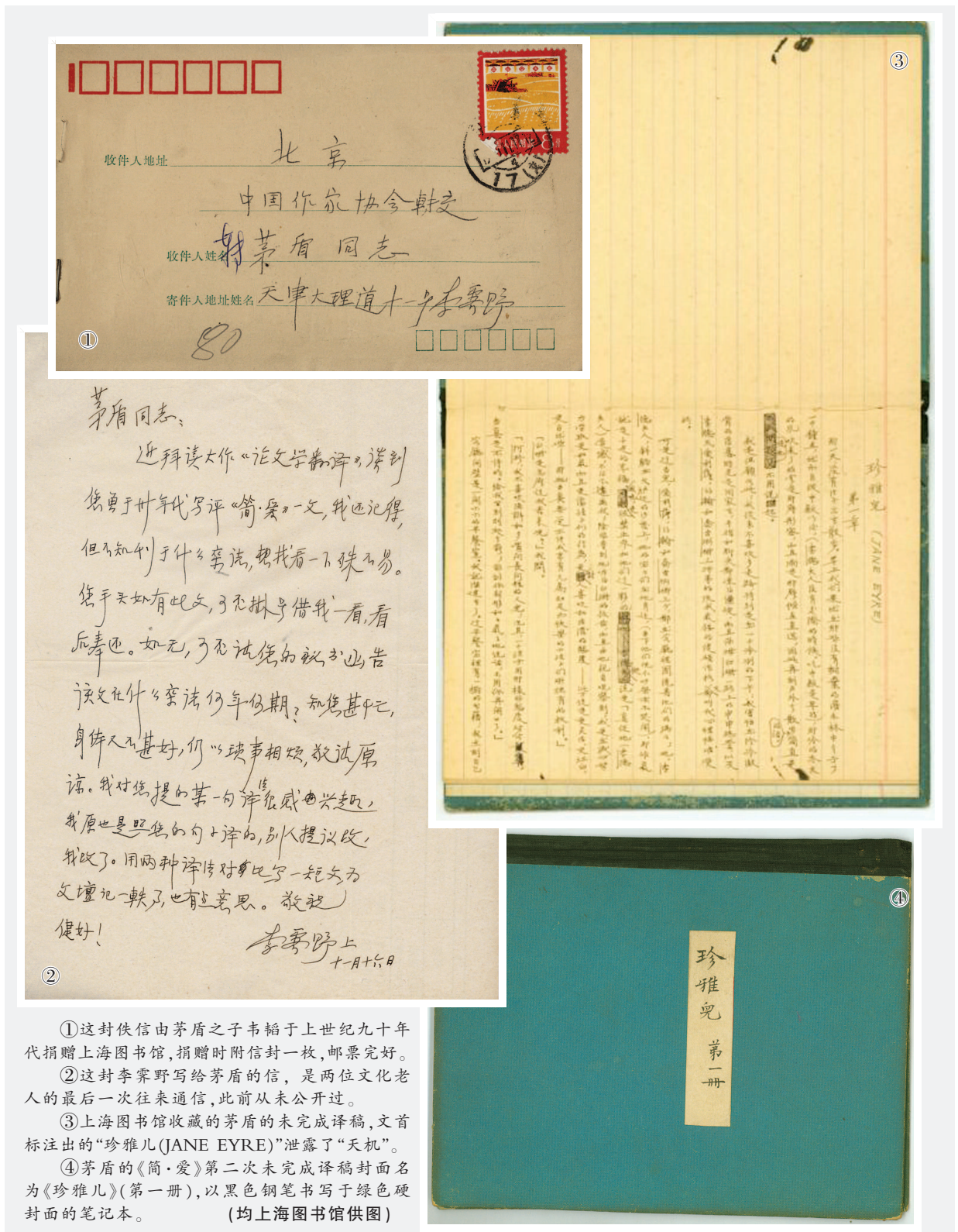
李霁野收到回信不到一个月,茅盾便与世长辞

这两个最新发现,始于上海图书馆今年春天与大英图书馆联合举办的“文苑英华——来自大英图书馆的珍宝”展。这是两家图书馆之间的首次深度合作,也是中英两国一次意义深远的人文交流。展览中,大英图书馆提供了五位英国文学巨匠——夏洛蒂·勃朗特、D.H.劳伦斯、珀西·比希·雪莱、T.S.艾略特、查尔斯·狄更斯的手稿原件;而上海图书馆则结合中国出版的各类文献实物和该馆中国文化名人手稿馆馆藏,向人们直观呈现英国文学如何通过中文译著、编著与上海这座城市产生共鸣。

备展期间,上海图书馆中国文化名人手稿馆馆员刘明辉在对馆藏的八万余件书信和手稿进行遴选时,发现了一封李霁野写给茅盾的信。该信未见于二人的全集、书信集和文集等相关文献及学界的研究论述,确定为佚信。它由茅盾之子韦韬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捐赠上海图书馆,捐赠时附信封一枚,邮票完好,邮戳未显示寄信年份,信件的落款也只有几月几号。

这封信的正文只有短短200字不到。信中,李霁野提出希望重读茅盾“曾于卅年代写评《简·爱》一文”,理由是“我对您提的某一句话译法很感兴趣,我原也是照您的句子译的,别人提议改,我就不禁让人好奇;李霁野信中说的是哪一句译法?谁提出修改建议?信写于哪一年?茅盾收信后是否回了信?经过数月的认真探究和相关文献佐证,刘明辉考证出写信年代为1980年,当时李霁野76岁,茅盾84岁高龄。次年,李霁野收到了回信,不到一个月茅盾便与世长辞。这封信成为两位老人最后的一次往来通信。

通过文本细读和内容分析,一段鲜为人知的译坛往事被打捞出来。目前学界已知的一个说法是:李霁野翻译出《简·爱》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后,最早联系的出版机构是中华书局。他曾于1933年7月20日写信给中华书局,欲将译稿出售给该书局,但被时任编辑所长的舒新城批示“不用”,此信目前藏于中华书局的档案中,是一个重要的见证。但是,刘明辉根据《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的记载发现,在此之前,李霁野曾主动联系周作人,请他转给胡适看稿,希望能向周主持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出售译稿,但没有获得响应。据李霁野撰写的《悼念茅盾同志》一文的回忆,他写给茅盾的信中提及的“别人



①这封信由茅盾之子韦韬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捐赠上海图书馆,捐赠时附信封一枚,邮票完好。  
②这封李霁野写给茅盾的信,是两位文化老人的最后一次往来通信,此前从未公开过。  
③上海图书馆收藏的茅盾的未完成译稿,文首标注出的“珍妮儿(JANE EYRE)”泄露了“天机”。  
④茅盾的《简·爱》第二次未完成译稿封面名为《珍妮儿》(第一册),以黑色钢笔书写于绿色硬封面的笔记本。(均上海图书馆供图)

提议”中的“别人”正是胡适。而在向胡适荐稿失败后,李霁野又向中华书局做出了推荐。

《简·爱》中文译著,曾经经历了曲折的出版过程

那么,中华书局为何没有接受这份译稿?“理由是舒新城早已约请了一位文坛大家来翻译这部作品,这位大家即是茅盾。”刘明辉告诉记者,从茅盾与舒新城的往来书信中可以看出,早在1931年,舒新城就请茅盾来翻译《简·爱》,1932年因战争原因中止翻译。这是茅盾第一次翻译《简·爱》。第二次,则是1935年郑振铎编《世界文库》,邀请茅盾翻译一篇连载的长篇小说。这件事在茅盾的晚年回忆文章《一九三五年记事》中曾被提及:“我答应了。当时我打

算翻译英国女作家勃朗特的《简·爱》。我读过伍光建译的本子(伍译叫《孤女飘零记》),觉得他的译文删节太多了,所以想重译。可是才开了一个头,就被杂事打断了。看交稿的日子渐近,又不愿意边译边裁,只好放弃了原计划,改译了一篇比昂逊的散文《我的回忆》。”循着这一线索,刘明辉在中国文化名人手稿馆茅盾名下的1215条记录里惊喜地发现了《简·爱》第二次未完成译稿。它同样出自茅盾之子韦韬捐赠,于1996年3月入藏上海图书馆,包含了“第一章”至“第三章”的译文,共计16页。该译稿封面名为《珍妮儿》(第一册),以黑色钢笔书写于绿色硬封面的笔记本。乍一看,不容易发现是《简·爱》的译稿,但文首标注出的作品英文名“珍妮儿(JANE EYRE)”泄露了“天机”。“正是因其译名与后来通行译名相

距甚远,以致入藏22年未被注意。”刘明辉透露,茅盾的这一未完成全文采用竖排格式,字迹端正清秀,行文整齐,改动处不多。作品封面既然写“第一册”,可以看出茅盾有译完的规划。从文始到文末,笔力一致,呈现稳定的状态,折射出书写者处于较好的身体和精神状态。由此可知翻译的中止并非由于健康因素,正对应李霁野自述的“可是才开了一个头,被杂事打断了”。

“在战争的炮火中,李霁野和茅盾几乎同时在翻译《简·爱》,彼此互不知晓;约五十年后,李霁野向茅盾致信请益,仍不知当时中华书局拒收自己译稿的缘故,而茅盾也从未提及自己这份半途而废的弃稿。”刘明辉说,在感叹《简·爱》译者出版波折的同时,也可以看到,上世纪三十年代《简·爱》已受到国内有识之士不约而同的关注。